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晋石刻大全



● 临汾市曲沃县卷

主编

雷涛
孙永和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晋石刻大全

临汾市曲沃县卷

主编

雷涛
孙永和



三晋石刻大会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石刻大全. 临汾市曲沃县卷 / 雷涛, 孙永和主编;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457-0065-7

I. 三… II. ①雷…②孙… III. 石刻—曲沃县—
图录 IV. K87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6133号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

总 主 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本卷主编: 雷 涛 孙永和

责任编辑: 李永明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晋城市景潮办公用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8

印 张: 63

字 数: 504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 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065-7

定 价: 380.00元

ISBN 978-7-5457-0065-7



9 787545 700657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晉恭世子碑銘

晉恭世子碑銘
前字孟州王屋縣尉張階
夫體鼠甘口醫藥青華洞貫而不失其痛謫人甘言離開骨肉殘殺而不知其偽設斯通者里
妬婦與小人圖利而為之也然不能移上智抑足以惑中人是則甘之為害在言益深言之太甚
也晉恭獻公甘驪姬之讒使申生自殺於新城春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其用讒名也
其陷父於獄申生之死不若逃之雖恭為牙之道且失顯親之孝諡之曰恭亦有微旨國人憐其
而祭之迄今千百季民意不喪祠字愈尊者亦所以龜鑑後人爾或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豈獻公
佗人而不慈愛於其子邪況夫尊慈忍愛護者之有由也初驪姬欲譖申生與優施二嬖嬖圖之
而甘其言僅十年而事乃就固非一朝一夕漸薰藉之臭也始則譽申生之賢而指公之慈次則
之得眾而懼公以行彊終則置毒於酢而取信於公苟非生而神靈躬有明哲其孰能辨之哉且驪
婦也欲費子而福己優施二嬖皆小人也任信於公苟非生而神靈躬有明哲其孰能辨之哉且驪
乎今之讒或有甚此者大率衣儒服讀聖書竊君子之名齒士人之列罔有攸賴不惠其私離間人
父子兄弟親戚交朋以至於誅殺殘虐分爭連戾離惡棄絕者固甚於驪姬之與小人圖利而
也天乎好讒之人果造物者使之然邪性使之然邪苟性使之然曷不杜其間以贖室其視以瞽秘其言以音雖讒
難毒於人而不得而避之明白之甚也苟性使之然曷不杜其間以贖室其視以瞽秘其言以音雖讒
心中而耳目不得而治已又何必禍淫以懼惡降殃以譴邪乎釋名曰碑者悲也申生諸死孰不悲
之則天下無為而治已又何必禍淫以懼惡降殃以譴邪乎釋名曰碑者悲也申生諸死孰不悲
之讒愈可悲矣必正其道謹作銘云

周文將王 太伯之奔 避聖讓位 丕基有成 晉文將霸 申生自縊
雄圖始耳 太伯之奔 雖云被謫 人誰不知 辭而可辨 全生者賢
機劣之開 差遠千里 徒使人悲 嗚呼 人之為讒 去之可惡 弗傷
奚齊兵殺 謀之不臧 旋見屠滅 敢告讒人 響應昭晰 天亦速絕 驪姬
昭寧八年九月十五日男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世長立石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问：薛延忠 金道铭 申维辰 申联彬 李小鹏 高建民
胡苏平 张 平 李立功 王庭栋 胡富国 白清才
郭裕怀 杨安和 李学勤 姚奠中 张正明 令政策
李潭生 刘 江 张 领

主任：刘泽民
常务主任：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张国祥 刘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
柴泽俊 刘纬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赵望进 杨子荣
储仲君 郭双威 梁俊明 赵华山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敏政 石金鸣 史耀清 刘光彦 齐荣晋 李 尧
李 非 李小强 吴广隆 张鸿仁 陈长禄 高 可
崔正森 董占锁 董瑞山 潘孝忠 霍润德

总主编：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李玉明

副主编：罗广德 李茂盛 杨子荣 张继红 落馥香

审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编纂指导组

组长：陈长禄
副组长：王德贵 常引根
成员：张 彪 王汝雕 李兆祥 张新智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编纂委员会

顾问：张建山 畅红娟
主任：雷 涛 孙永和
委员：史俊杰 孙丽萍 孙新荣 吴绍雄 张庆奎 张红琴
常志武 雷 涛

主编：雷 涛 孙永和
副主编：孙新荣 吴绍雄 常志武 张庆奎

编辑：李明秀 张红琴 魏彩霞 祁俊芳 侯丽红 杨 俊
李建刚

拓印：段引凤 石泽威
编审：王汝雕 史俊杰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以《三晋石刻总目》为基础,凡古代、近现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布施碑也全部全文收录。其中新中国成立后镌刻的碑碣,除没有什么社会和文化价值的诸如私人一般墓碑等不收外,其余原则上都收录。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合”,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

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铭和墓志,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录文分两部分,即现存石刻、佚失石刻。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件石刻编纂内容包括“名称”(全称)、“简介”、录文(全文)。元代(含元代)以上的石刻每通(件)提供黑白照片或拓片若干张(全景和特写),明清以后石刻遴选重要者提供,备制版用。

七、凡属涉及人物的石刻,在“简介”中介绍石刻之后,再介绍人物的生卒年、字号、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

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

介休市)人。

八、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九、真伪莫辨或年代尚无定论的石刻,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帝王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627)。括号内公元年号前后不加“公元”和“年”字。1912年以后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括号内公元年号前后也不加“公元”和“年”字。1949年10月1日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纪年标准,参照《辞海》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

十一、表示体积、面积等尺寸的,以“厘米”为单位。如长(或高)120、宽60、厚80厘米,长、宽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又如高120、宽60厘米,高也不加“厘米”。

十二、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1957年汉字简化之后,有的碑繁简混用,录文都保持原貌,以保存史料的真实性。除录文外,其余文字均使用标准简化字。

录文横排,原则上根据文意分段,不易分段的,可以连排。编者所加文字,用楷体字,并加圆括号,以与正文宋体字区别。如“(碑阳)”、“(碑阴)”等。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及不当之处等,保持原貌,不用甄别、注释,不加括注。

十四、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下阙”表示。

十五、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阅读,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序

· 李玉明

总
序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是立于墓前用于棺木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轭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头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久,常常以龟(实际称赑屃)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卣》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峄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寃、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庾狄回洛、娄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

的原因(如信息不畅),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各类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石刻最多时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团体,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只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摭,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拾遗补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具有不能再生性的特点,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佛,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山西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一

陈长禄

临汾,史称平阳,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的中心地带,现辖一区、二市、十四个县。临汾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文化底蕴深厚,地上地下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28处,居全省、全国前列,其历代石刻之丰富,更是名冠三晋。

石刻虽然坚硬,也有风化殆尽的时候,加上历史上临汾一带是兵家必争之地,强烈地震又多,临汾的碑刻在1949年前就损失不少。新中国成立后,战乱兵燹虽成历史,但古老石刻流失和被盜被毁现象仍未绝迹,如今临汾的石刻除少数保存较好以外,相当一部分或矗立于乡间小庙,或倒卧于荒烟蔓草,或已散落民间被挪作它用,随时都有佚失之虞。

石刻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大多数碑碣上的文字是一种公开的地方历史档案。与传世文献相比,石刻文字更具有地方性与民间性,往往直接记述了当地历史人物的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它是研究区域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一些学者将金石文字与地方志、宗族谱牒并列为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三大史料来源,是有道理的。

临汾历来重视石刻文字的收集和整理。明清的地方志书,大多收录了本行政区域内的重要碑文。晚清以来,临汾开始有了金石著作。同治年间,洪洞董文灿撰有《山右碑目》书稿一卷,惜已不存;光绪年间,临汾宋琦撰有《山右金石存略》二十一卷,其中卷三至卷二十一今存新绛县;乡宁杨笃在纂修《山西通志》的基础上,将《山西通志·金石记》析出单行本《山右金石记》十卷,刊行于世。光绪年间编成的《山右石刻丛编》,收集了临汾地区87篇碑刻文字,其中半数今已亡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多部金石文字专著。上世纪九十年代,郭居明编撰了《乡宁碑文选》;由王汝雕编著的《山西地震碑文集》和由王汝雕、牛文山编著的《临汾历代碑文选》分别于2003年、2005年出版;2005年,侯马市、曲沃县的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分别编印出《侯马碑记》和《曲沃三十八通古碑注》;2007年,李国富、王汝雕、张宝年编著的《洪洞金石录》出版。但在这期间最大的工程是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于2001—2004年组织各县市理事对全市范围内留存的历代碑碣进行的一次全面调查造册。这次调查登记了上自北魏,下至民国各个朝代的碑碣4003通,搜集碑文数百篇,编辑出版了58万字的《三晋石刻总目·临汾市卷》。这部《总目》成为临汾市编纂《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各县(市、区)分卷的重要参考依据。

此次由三晋文化研究会发起编纂《三晋石刻大全》,以县域为单位,每县(区)一卷。石刻编选时间下限截至各分卷定稿,无论编选范围还是时间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正是我们所期盼的一件泽被后人的大好事。

临汾市境内现存的石刻中,重要的有:浮山唐玄宗李隆基《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御制御书碑及元代《传谕蒙哥皇帝旨碑》;吉县锦屏山北魏、隋、唐及宋、元摩崖石刻;襄汾北魏、北齐、隋、唐造像碑,清代董其昌撰写的《昼锦堂记》;曲沃宋代吴勉之的《晋恭世子庙碑并序》,元代的《释迦如来成道记》;乡宁元代《重修晋荀息大夫庙碑》;翼城赵孟頫的《大元晋宁路翼城县金仙寺住持弘辨兴教大师裕公和尚道行碑》以及元大德十一年《上天眷命碑》,明代《欧阳永叔醉翁亭记刻石》;洪洞宋代《大宋新修女娲庙碑铭并序》;尧都区宋代《晋州姑射仙洞新修功德记》;安泽北魏、北齐造像碑等。历代名人撰文书丹的有襄汾虞世南的草书碑,洪洞宋治平元年郭子仪的奏牒碑,金代张商英霍山诗碣,襄汾苏东坡的行草圆碑,文徵明的草书碑,郑板桥的行书碑,侯马《乾隆御笔千叟宴诗碑》,洪洞清代何绍基的《猎碣亭》及香梅的宋拓本勒石的石鼓文,襄汾丁村赵邦清的楹联以及地方一些名人书写的篇章、铭文、诗词、楹联等等。这些石刻在历史、科学及石雕艺术与书法艺术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唐玄宗李隆基的《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称太上

老君为其远祖,在高祖、太宗之际,显化于龙角山。其汉隶八分体书飘逸潇洒,结体紧峭,点画之间自有异趣,实为唐代的杰作。《晋恭世子庙碑并序》的颜体书法,端严秀健,笔力道劲,古朴豪放,是宋碑中之佳作。《大元晋宁路翼城县金仙寺住持弘辨兴教大师裕公和尚道行碑》书法刚劲沉稳,圆浑道美,全篇气势连贯,法度严谨,笔老墨秀,洒脱超逸,横竖点画,笔笔着力,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界,是赵体中最完整的一通碑刻。再如明正德九年(1514)《增修尧、舜、禹庙图碑》和明嘉靖十八年(1539)镌刻的《祭祀仪注、尧陵及庙宇建筑分布图碑》均分别记述、绘制了元明以来尧庙、尧陵之规模、布局、建筑形制和陵寝祠宇规模形制等,用图例刊于石,是研究其建置、沿革的有力佐证。襄汾的普净寺,霍州的中镇庙,翼城的乔泽庙,尧都区的大云寺、牛王庙、坡子村,洪洞的广胜寺,吉县的圣母庙,蒲县的东岳庙等地的石刻碑碣,都较详细地记载了元大德七年(1303)和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平阳两次大地震的实况,是考察历代地震、探索地震规律重要的历史证据。《增修康泽王庙碑》记述了平水源头,方圆百里到处涌泉,严禁开山凿石,保护泉源之事。洪洞广胜寺《重修明应王殿碑》,明确规定了三七分水的制度,并设置了铁栏记标,使之正常管理灌溉。另外,乡宁、大宁、吉县、曲沃、隰县、蒲县等地都用碑刻记载了争水、斗水、分水等方面的史料。再如有关教育兴学、发展生产、灾荒赈济、民间习俗、乡规民约之类碑刻,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除以上重要的碑刻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先辈们也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址和文物,其中碑刻也不在少数,所有这些都是在今天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资料。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各县(市、区)的编纂工作得到了临汾市委、市政府以及各县(市、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编纂工作按照预期进度圆满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我们相信,《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各县(市、区)分卷的出版发行,不但对全市范围石刻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而且对于文化强市、文化强省的建设也大有裨益。

序 二

中共曲沃县委书记 杨治平

曲沃县,位于山西省临汾盆地南端。新中国成立后,其行政建制曾有过数次变化。1958年,与新绛县、汾城县、乡宁县之关王庙公社合并,称侯马市。1963年,原侯马市撤销,曲沃县恢复原建制。1971年,与今侯马市分治。现辖5镇2乡,158个行政村,总面积437.9平方公里,人口23万。

曲沃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旧志云:横亘于县域北部的桥山,“世传轩辕黄帝葬此”,古之先贤、诸子百家之一的“子华子程本以轩辕陵在山著‘问鼎文’”。近代国学大师钱穆亦认为,这里系华夏始祖——轩辕黄帝最有可能的埋骨所在,亦即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黄帝崩,葬于桥山”之“桥山”。遵循这条脉络,至夏、商、周时期,这里又是大夏之墟,古唐之国。而随着轰动海内外的曲村—天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又确凿地证实了这里乃叔虞封唐之地、三晋发祥之端。两千多年前,称雄华夏的晋文公,便是以此为中心,建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煌煌霸业,书写下“晋国天下莫强焉”的壮阔画卷。到明清之际,这里更成了山西中南部的商埠重镇,百业兴隆,繁盛一时,“天府雄风、三晋重地”之誉,遂因之而鹊起。

数千年历史的演进,社会的进步,加之先天丰饶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一方繁荣昌明的文化艺术,作为三晋文化源头的曲沃,不仅存留有大量研究价值极高的地下文物,也保留了一批或秀美典雅、或雄浑大气的名胜古迹,特别是留存下数以百计弥足珍贵的石刻碑碣。它们既是曲沃历史发展的记录,更是曲沃文明进程的见证。

物换星移,岁月如梭。与共和国60余年前进的脚步相随,同改革开放30余年的化雨春风相伴,古都曲沃已然天翻地覆,沧桑巨变,同时又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面临着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阶段。在此过程中,文化的力量 and 作用越来越强劲地突显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把编纂《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作为实施“文化立县”战略的一项重点工程,当作整合文化资源、打造文化精品、促进和谐曲沃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列入县委、县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在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精心指导下,责成县文物管理中心和晋文化研究会紧密配合,抓紧实施,历经一年有余,终于成就了这件曲沃文化建设史上的盛事。

这部《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收录了上自北魏,下迄2009年的354通石刻铭文。石刻类型齐全,铭文内容丰富。所记述的事情,大到国家重大事件,小到市井平民活动,无所不及;所记录的景物,从名刹寺观,到村野路桥,无所不包;所记载的人物,从名士显宦,到贩夫走卒,无所不有。这些石刻文字,从一个又一个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曲沃上千年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真切面貌,不仅为研究曲沃的过去提供了最为直接可靠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作为缩影,折射出中华文明的熠熠光辉。这笔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将会日益显示出她的魅力与影响。

石刻,是伴随人类文明而生的行为艺术,是人类自我表达与心灵诉求的极朴素自然的一种艺术形式。而碑碣铭文,则是中华民族先祖在造纸术之前,为传播历史文化而发明创造的最佳文字载体,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一大独特贡献。因此,我们有理由为《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的成书而感到自豪。然而,回顾历史是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鉴赏石刻是为了建树更加伟大的丰碑,这才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根本使命所在。我们坚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饱经沧桑、历尽艰难、富有革命斗争经验与开拓创新精神的曲沃人民,一定会在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创造出更大的辉煌业绩,谱写出更多的不朽篇章。

概述

曲沃县位于临汾盆地南端,历史上含现曲沃与侯马两境,1971年侯马设市析出后,仍沿旧称。现有面积437.9平方公里,辖5镇2乡,194个自然村,人口23万。

曲沃历史悠久,其名称最早见于文献典籍,在《左传·鲁惠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745年,距今已有2756年的历史。曲沃最早设置为县,则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迄今也长达1524年。曲沃山川秀美,人文遗存丰厚,堪称华夏文明大花园中一株绚丽多姿的奇葩。其境内,绛山桥岳对峙南北,滏河浍水横贯东西;浍河水库的浩淼烟波,洋溢着江南水乡的绮丽秀媚,磨盘岭上虎踞龙盘的高原沟壑,尽现出黄土地的苍劲粗犷;素湍如练的景明沸泉早因《诗经》而闻名古今,平畴沃野的太子滩更借晋世子故事而蜚声海内外;县城内华美玲珑的四牌楼,是八方游客必睹为快的古建瑰宝,古朴雄浑的元代感应寺塔,令观者顿生沧桑之幽思;曲村镇现存宋金大悲院遗迹,每寸浮雕,每块壁画,都折射出古晋先民的艺术光辉,曲沃中学所保留的明清书院建筑,一楹一柱,一砖一瓦,皆见证了曲沃人代代相承崇尚文教的好学之风;县之北境桥山一带流传千年的黄帝陵传说及其故地,日益吸引着学者文人探寻的目光,而两次被列入20世纪中国考古重大发现的“晋侯墓地”,更是以其规模之大、文物之丰、意义之重而轰动世界,从而一举确立了曲沃作为“晋都故地”、“三晋之源”的历史地位。山西省人民政府遂因此批准立项,在其遗址动工兴建“晋国博物馆”。它已成为举世瞩目、万众期待的一颗崭新的历史文化明珠。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曲沃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摆脱旧中国残存落后的旧制度的束缚,不断解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的羁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成就,铸就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使脚下这块古老的土地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综合实力连年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个文明、富裕、和谐的新曲沃正展现于世人面前。

历史的进步与传承,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与记录。同全国各地一样,曲沃作为历史文化渊远流长的礼仪之邦,虽经历代动乱销磨,仍然保存了数量可观的碑碣及各类石刻,不仅为今天人们研究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探寻自然演化与社会兴衰,提供了最为直接可靠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已然成为三晋文化的主体成份和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挖掘、整理、保护这一历史遗产,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足以无愧先人并造福来者的功业之举。

这部《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由“现存石刻”与“佚失石刻”两部分组成。现存石刻,收录现存的唐代以后石刻文字271篇;佚失石刻,收录北魏以后的佚碑碑文83篇。在271篇现存石刻文字中,按年代划分,唐3篇,宋3篇,金2篇,元7篇,明35篇,清155篇,民国16篇,中华人民共和国41篇,纪年不详9篇。在83篇佚失石刻中,南北朝1篇,宋5篇,金2篇,元5篇,明19篇,清48篇,民国2篇,纪年不详1篇。

按类型分,有碑276通,碣16块,墓志铭47盒(方),经幢2尊,匾额3块,其它10件。按内容分,有历代名人神道碑10通,功德碑23通,墓志墓表53方;有关记载佛、道宗教的106通;有关文化教育的48通;有关农业生产、水利商贸、经济社会的58通;有关地震灾荒的1通;有关宗社家族、村规民约的10通;记述自然风物与地理状况的15通;其它30通。上述石刻所记叙的事件,大自国家政治活动,小到百姓生活常态,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及。所记载所涉及的人物,则上自帝王将相、显宦名士,下至贩夫走卒、乡民村妇,亦称得上“群贤毕至”,众生云集。它们从一个又一个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曲沃上千年文化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啻为一组独具特色的史诗,一幅别开生面的画卷。

存世的这些石刻文字,大多出自当时士大夫之手,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风格与技巧,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就有许多可资鉴赏之处。若从社会演进与文化艺术发展的角度审视,其价值就更为重要。

这类石刻中的精品,大约占到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较为珍贵的有:唐代《张凤墓志铭》;宋代《晋恭世子庙碑并序》、《创建文庙碑记》、《翼城温泉十村移割曲沃一县管辖条制》、《书魏贾逵碑后》;金代《大悲院新修卢舍那佛记》、《佛泉分水碑记》;元代《敕赐朝列大夫同知晋宁路总管府事致仕靳府君碑》、《释迦如来成道记》、《清源王庙碑》;明代《白石楼记》、《修黄帝庙碑记》、《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碑》;清代《瑞石园记》、《挑浚星海记》、《曲沃会馆序》、《曹月川先生传》、《曲沃桥山书院碑记》、《乔山书院建修子朱子祠记》、《地震碑记》;中华民国《曲沃县城镇商界创建商会及商界会馆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汾河水库纪念碑》、《王德合同志之墓》,以及历代地方名人雅士书写的碑铭、诗文等。这些石刻,为我们研究历史、科学及文化艺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资料与信息。例如:北魏《造像碑》是临汾地区现存同类碑刻中年代较早的一通。贞观二十三年(649)刊刻的《张凤墓志铭》则是全县仅存的唐代碑记,弥足珍贵。宋代的《书魏贾逵碑后》,不仅使我们领略到文学大家欧阳修治碑的文风,更为今人澄清了三国人物贾逵祖籍在河东平阳,而非历来主张的河南之误。刊刻于清咸丰二年的《靳氏大祭时祭纪略》,记录世家宗族祭祖活动的全过程,不仅省内仅有,国内罕见,而且为三晋非物质文化遗产增添了新内容。《知县张坊请改蒙城驿归太平县史村厂案》,记叙了自明迄清三百余年驿站设置及沿革,为我们研究中国封建时代邮传制度,提供了详实资料。而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由山西巡按李若星撰文、曲沃县知县何承祚勒石的《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碑》,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公正执法,仍有一定现实意义。

曲沃作为晋文化的发祥地,崇文重教的传统绵延不断。反映在石刻中,每个朝代都有修文庙、建学宫的碑记,此次辑录入册的共23篇。其中清代贾汉复的《曲沃桥山书院碑记》,表达了封建士大夫贡献桑梓教育的拳拳之情,展示了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与积极助学的无私精神,是这类碑文的代表作。清顺治九年(1652)的《命礼部颁卧碑于天下学宫碑文》,则是礼部颁定学校生员遵守的教条,其约束之严,规定之细,说明即使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廷,同样重视文教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古代中国,佛教道教流布极广,与佛道并行的各类神祇仙灵也大兴其道。曲沃亦然。本卷收录的有关石刻共有106篇之多,告诉我们古之曲沃,几乎村村皆有佛寺道观或者祭祀关帝、黄帝的庙堂建筑。这些石刻所传达的信息,使我们对先人的精神世界,以及附着于宗教建筑、绘画的文化艺术,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灵光寺祖师德业碑铭并序》,记述当时曲沃最大佛寺灵光寺三代主持扩充寺产、宣扬佛法的经历,显示了宋元之际当地佛教的盛况。清代同治四年所刊的《重修后土圣母殿记》,虽然只是对一座乡村圣母庙兴衰的记录,但其中三次提及的“赛事”,令我们对古代民间迎神祭神的社火活动,遐想联翩。此次收集的354通石刻中,有十余篇关于修建黄帝庙的碑记,说明古代曲沃对黄帝的崇祀,较其它地区为甚。究其原因,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轩辕黄帝陵确在曲沃。这些碑刻,也为明清各版本《曲沃县志》中关于“黄帝葬于县北桥山”的记载,提供了有力旁证。

曲沃“水深土厚”,自然资源丰富,农业、水利自古就较为发达。尤其水利建设与管理,在历代石刻中皆有所反映,本卷有关碑刻即有23篇。其中,记载水利工程、修葺庙宇的居多,记叙使水纷争及处置办法与水利管制的亦占一定份量。《景明林交争水案碑记》记叙了清嘉庆年间两村民众长达三年的争水案情,以及省、县两级主政官员判案结果,将当时情景再现于今。《温泉龙神行宫记》行文简洁,文采熠熠,以不到四百字的篇幅,叙述了自唐及宋而至于清,其间七百年曲沃的水利兴衰史,歌颂了龙神德泽,描绘出因水利而繁荣的农业与曲沃先民和乐的农耕生活状态。《汾河水库纪念碑》是本卷唯一一通新中国水利工程碑,它详细记录了1958年这座全省最大水库的兴建始末,表现了当代曲沃人民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与前无古人的伟大业绩。

曲沃名人辈出,灿若群星。翻检历代石刻,赫然其上者有:《晋恭世子庙碑并序》所颂扬的晋世子中生,《书魏贾逵碑后》所记之三国曹魏重臣贾逵,《汉汾阳严侯靳公强祖之墓碑》所记之西汉开国功臣靳强,《曹月川先生传》所记之以一句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而著称后世的明初大儒曹端,《光禄大夫少师兼太子太师保和殿大学士户部尚书曲沃文清卫公周祚神道碑》所记之历仕顺治、康熙

两朝,两入内阁、三为卿贰、四晋官保太傅、参与并主持修定《大清律》的卫周祚,《尚书贾公创建义学碑记》所记之清兵部尚书贾汉复,《郡守卫公台揆德政碑记》所记之清康熙时台湾知府卫台揆,以及《王德合同志之墓》所记之全国劳模王德合。同时还必须提及的,是与本卷石刻文章相关的几位非曲沃籍名人,他们是:《书后汉竹邑侯相张寿碑后》作者欧阳修,《白石楼记》作者明状元吕柟,《日知录》作者顾炎武,《重修曲沃会馆序》等六通碑记作者、在曲沃任职时政声卓著的清乾隆年间知县张坊。他们对曲沃的人文关怀与贡献,永远与碑同在。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同文明发达较早的中原其他地区一样,曲沃在社会治理与道德构建上,都积淀了丰富的经验。体现于石刻,主要是有关吏治、乡规民约及族规家训这三方面。现存于曲沃中学院内的明代《奖励知县赵彦复碑》,是万历皇帝为清明吏治、褒奖能员而颁刻的,与另一现存明碑《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的严责厉诫,一柔一刚,目的虽都是为了稳固皇权统治,然而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西杨村规碑》则是民间维护社会秩序的乡规民约,其内容切实而具体,显示出百姓自治的智慧。清代的现存碑刻《诚敬堂训示碑》与佚碑《日省斋自志戒文》,则为人们提供了家庭道德教育的范本。最值得称道的,当数清乾隆年间的《弭盗安民官厘法》,堪称封建社会地方治安的一大创举。

此次收录的中华民国现存碑 16 通,佚碑仅为 2 通,虽然数量不多,但时代特征鲜明,如《曲沃县城镇商界创建商会及商界会馆序》,是曲沃商会创始的实证。《创立消防会记》则标志着近代科技的引进。《陆军第三军第二师张师长荃臣先生整军爱民纪念碑》,为抗日名将张自忠的壮烈人生留下浓重一笔,是民国时期唯一见诸曲沃石刻的知名人士。

新中国成立以后刊刻的碑石,此次收录的有 41 通。其中反映重大工农业建设成就的 9 通,宣扬文教事业成果的 11 通,纪念革命烈士的 4 通,记载模范个人的墓碑 4 通,各类标志碑 13 通。它们都从不同侧面见证了建国 60 年来,曲沃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艰苦奋斗历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北大学子撰刻的《聚云赋》,通篇文情并茂,石质书法俱佳。记录了以邹衡先生为代表的考古系师生,在“曲村—天马”遗址长达二十余年发掘探索的艰苦历程,字里行间流露出青年才俊追求真理、科学报国的豪情壮志。他们的骄人业绩与碑刻一起,将永远屹立在曲沃大地上,流芳百世。

总之,收入本卷的 354 篇石刻文字,不仅是先人遗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是三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促进曲沃文化繁荣、推动曲沃历史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这些石刻文字,将与石刻本身一样,万古长存,永垂不朽。

让我们赞美石刻,将无言的历史鲜活、生动地呈现在今人面前;让我们感恩石刻,昭示并激励后人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编委会

目 录

凡例

总序	李玉明
序一	陈长禄
序二	杨治平
概述	编委会

上编 现存石刻

●唐●宋●金

张凤墓志铭(贞观二十三年十一月)	(五)
大周故公士董君墓志铭(武周万岁通天二年二月)	(七)
唐冯君墓志盖(唐代)	(八)
大宋故平海军司理参军史公墓志(宝元元年)	(九)
晋恭世子庙碑并序(熙宁八年九月)	(一一)
存留大悲之院碑(崇宁年间)	(一三)
大悲院新修卢舍那佛记(大定二十年)	(一五)
沸泉分水碑记(承安三年四月)	(一七)

●元

重修济渎清源王庙记(蒙古定宗二年三月)	(二一)
道教功德碑(至元十五年)	(二三)
敕赐朝列大夫同知晋宁路总管府事致仕新府君碑(延祐六年六月)	(二五)
灵光寺祖师德业碑铭并序(至元五年)	(二八)
释迦如来成道记(至元六年十月)	(三〇)
清源王庙碑(至正二年二月)	(三三)
大元加谥晋世子申生恭愍碑(至正七年十月)	(三五)

●明

义城重修砌造轩辕黄帝庙台捐银碣(洪武二十三年)	(四一)
平阳府曲沃县为乞恩分豁民情等事抄蒙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等衙门碑(弘治元年十月)	
.....	(四二)
重修古碾碑(一)(正德三年六月)	(四四)
郑氏明故碑记(正德九年三月)	(四五)
重修曲沃县城记(正德十一年七月)	(四六)
重修观音堂记(正德十二年)	(四八)
修黄帝庙碑记(嘉靖十二年五月)	(四九)